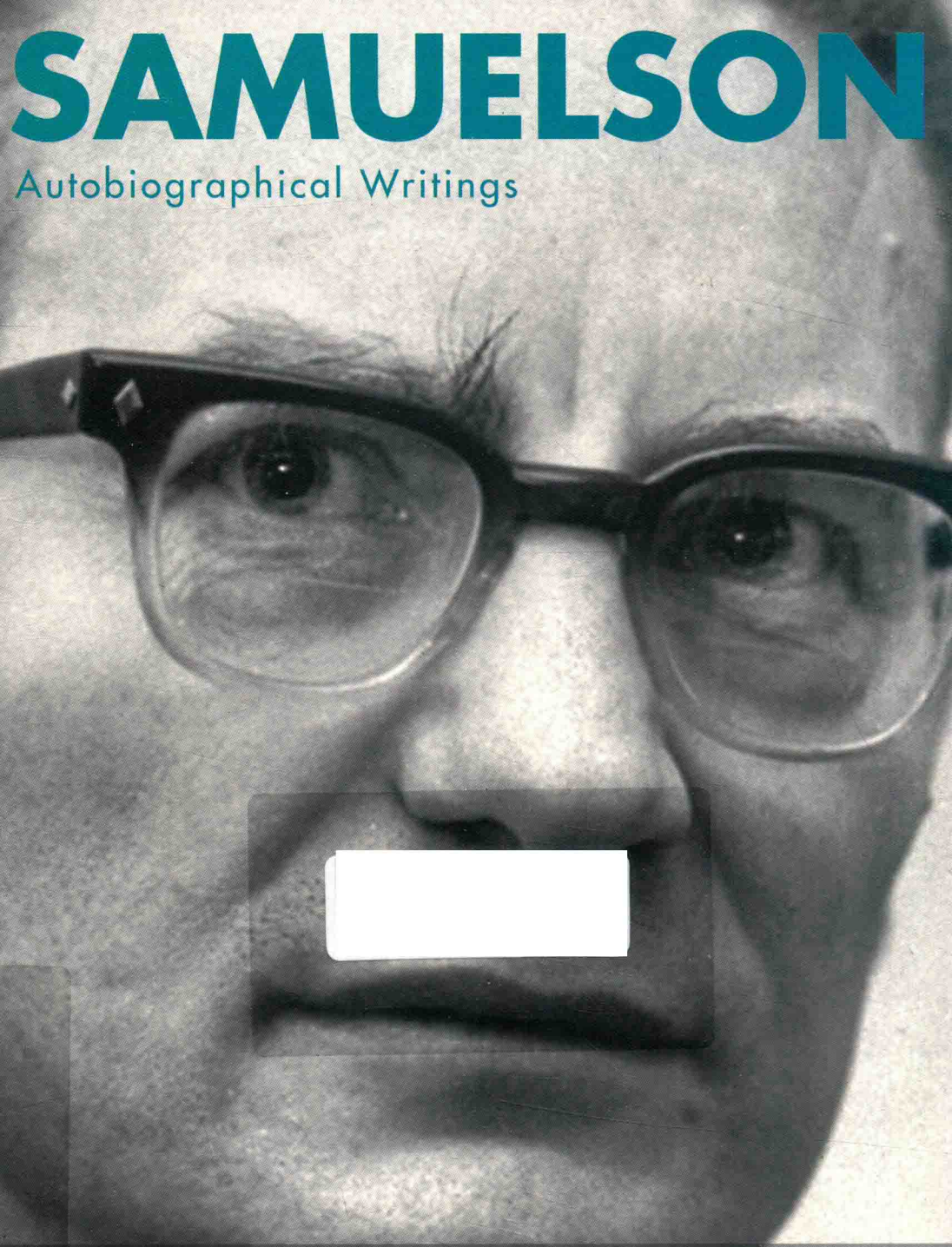
SAMUELSON

Autobiographical Writings



萨缪尔森自述

Paul A. Samuelson

[美] 保罗·A. 萨缪尔森 \ 著

吕吉尔 \ 译　赖建诚 \ 校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SAMUELSON

Autobiographical Writings

萨缪尔森自述

Paul A. Samuelson

[美] 保罗·A. 萨缪尔森 \ 著

吕吉尔 \ 译　赖建诚 \ 校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图书馆藏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萨缪尔森自述/(美)保罗·A.萨缪尔森著;吕吉尔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8
ISBN 978-7-5432-3118-4

Ⅰ.①萨… Ⅱ.①保… ②吕… Ⅲ.①萨缪尔森(Samuelson, Paul Anthony 1915-2009)-自传 Ⅳ.①K837.125.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0)第 103276 号

责任编辑 王 萌
装帧设计 路 静

萨缪尔森自述
[美]保罗·A.萨缪尔森 著
吕吉尔 译
赖建诚 校

出 版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 刷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1000 1/16
印 张 23.25
插 页 2
字 数 375,000
版 次 2020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2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32-3118-4/F·1298
定 价 85.00 元

推荐序

1990年3月，我38岁时，经济思想史名家马克·布劳格（Mark Blaug，1927—2011）告诉我："萨缪尔森的经济分析没多大意思，但他其他的著作都非常独特。"当时还年轻，不明白真正的意义，我自忖：这是美国首位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重要人物，著作影响战后全球的经济学界。他最拿手的数理经济分析，有许多我根本看不懂，为什么会没多大意思？

2016年7月，退休两年后，我找齐了萨缪尔森的7大册论文集，共有597篇学术论文，每册都超过千页。全都是期刊论文直接翻拍，因为他写得又快又好，重新排版校对都跟不上。我当然无法跟上所有内容，只能挑个我较熟悉的小领域，看能否瞧出点名堂。几个月后拟了篇稿子《萨缪尔森与辉格思想史观》，收在本书末当附录。

写了那篇文章我才明白，布劳格那句话的真义：萨缪尔森从生物学、物理学、数学、机械工程学，借用大量概念与工具，套用于经济理论分析中。他的哈佛博士论文《经济分析基础》（1947），就是这种手法的开山代表作。此书给数理经济分析开创了康庄大道，也吸引全球有自然科学根基的学者投入，兴盛了经济学的多元化与科学化。

对他批判最严厉的，是他在芝加哥大学读本科时的兄长：乔治·施蒂格勒（George Stigler，1911—1991，1982年获诺贝尔奖）与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2006，1976年获诺贝尔奖）。施蒂格勒认为，这种套用的手法，对熟习分析技巧的工程师，每几个月写一篇也没问题。根本性的质疑是：萨缪尔森的这种论文，除了提出数学定性与逻辑推论，能产生哪些有用的见解与思想？弗里德曼的反对角度是学派性的：芝加哥学派的市场机能、古典自由派取向，不愿接受哈佛、耶鲁、MIT的凯恩斯派取向（注重短期政策效果、强调政府的作为、用财政赤字刺激有效需求）。

芝加哥与哈佛、MIT的见解对立，有人戏称为淡水派（芝加哥位于北美五大湖区）与咸水派（哈佛与MIT在波士顿海边）之争。我支持施蒂格勒的批评，原因很简单。通读萨缪尔森近百篇的思想史论文（参见本书的附录），会有个明显的感觉：他根本不是在做思想史研究，而是把从自然科学借来的数学工具，先套在经济分析上，再套到思想史研究上。他对思想的内容与时代意义，着墨太少，甚至不在意。换言之，他是一以贯之地在做同一件事：Veni，vidi，vici（我来到，我看见，我征服）。

思想史学界的怀疑和施蒂格勒一样：这种做法能产生有意义的新知识吗？其实萨缪尔森内心也很明白，但就是无法克制这种征服欲。他曾说，日后在天堂遇见圣彼得（相当于我们的阎罗王）时，他要坦诚认罪，说他“最严重的罪行，就是用辉格史观（数理模型）研究科学史（思想史）”。我相信：读过萨缪尔森对《资本论》的分析后，肯定没人会因而抛头颅洒热血。

再举个实例，这是萨缪尔森在本书第2章《我们时代的经济学》的自陈：“命运一直安排我跟同时代的领军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分子生物学家密切交往。当前经济学方法论的批评者如果以为，像我这样的经济学者，会处心积虑要从上面这些人那里赢取赞誉，那就大错特错了。非经济学界的科学家，无一例外地对经济学的公理体系毫无兴趣。哈佛大学数学家乔治·麦基，从不想跟我讨论我的《经济分析基础》。反而是我的入门书《经济学》（或约翰·雷的利息理论），而不是像德布鲁的那种纯数学的细微之处，吸引了他的注意。”意指：数学界喜欢他的经济见解，而非数学技巧。

现在换个角度，谈布劳格评语的下半句：在经济分析之外，萨缪尔森的其他作品都非常独特有趣。我们译了这本《萨缪尔森自述》，充分认同这项观察。萨缪尔森的文笔精简、活泼、机灵，知识渊博，用典恰当。这给译者带来不少麻烦，但给读者带来不少知性乐趣与启发。

我引本书第7章《金融理论回望》首段为例：“有一次，有人让我来描述我在经济学中专攻的领域。我当时回答说，也许我是经济学界‘最后的通才’——因为纯理论、文字经济学和数理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

统计学和概率论、对外贸易和管理经济学，全是我的主要研究对象。这意味着我会对金融与风险理论，抱有某种随机关注。但实际上，这种说法并没有完全表达出我对该领域的兴趣和投入的精力。一般意义上的金融（个人层面上的和整体经济范围的），在属于我的20世纪，已经演化为最成功的一个领域，而我一直希望成为局中人。”

这类妙句全书随处可见，还有许多话中有话的隐喻，都让我深刻感受到：萨缪尔森的文字功力，超过他的数学方程式。数学技巧与时俱进，20世纪50年代的前沿数学，现在看来就普通一般。文字与见解的智能，反而最能经受时间考验。

台湾清华大学沈君山校长，年轻时是有知名度的天文物理学家，曾获美国业余围棋冠军，听说他的桥牌打得更好。有种传说：沈君山的桥牌比围棋好，围棋比物理好。武侠小说家金庸，某次请沈君山即席草拟篇文章，他看了之后说：“你的文章比围棋高明。”金庸颇好围棋，曾拜沈君山的弟子为师，同时也向老师的老师沈君山“斜斜一拜”，算是半个太师。

能被金庸称赞文章写得好，确实不容易。我拜读过沈校长几本散文随笔，确实通透酣畅。我完全同意金庸的判断：沈君山的文章比围棋好，围棋比物理好（但围棋比桥牌差）。借用这个故事，我对萨缪尔森的评判是：他的文章比数学好，学术见闻比经济分析有趣，人情世故比政策分析通达，非经济学的见解比专业论证更深刻，内在讯息比字面更丰富。萨缪尔森是二战后经济学界的标志性灯塔，让茫茫大海的船只有明确指引，更照亮了广袤的海面，可以说是学光普照。

本书就是这座灯塔的自述，内容章节虽然不够体系化，但也显现出更多内心的随机思维。萨缪尔森留下的文件与档案，数量惊人（约88 950项，长达119英尺，合约36米），典藏在杜克大学图书馆手稿部（参见本书附录末的解说）。英国学者罗杰·巴克豪斯（Roger Backhouse）参照这些手稿文档，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两册传记（上册2017年出版），书名：*Founder of Modern Economics: Paul A. Samuelson*（中译本已在翻译中）。

这本传记是外人眼中的萨缪尔森，文献齐备，各种角度都有。就好像半世纪来对灯塔很熟悉的四海船只，倾诉它们对这座灯塔的感情与见闻。相对地，这本《萨缪尔森自述》，是主人翁（灯塔）的内心话，是另一种形式的自传，与他人执笔的传记互为表里，相互辉映，相得益彰。听大师分享学术经验与心得，不亦快哉！

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1776）说：“做一个哲学

家，但在一切哲学之前，先做一个人。”(Be a philosopher, but, amidst all your philosophy, be still a man.)萨缪尔森在这本自述中，解说他如何成为伟大的经济学家，以及如何谦虚地展示博学、犀利、通达、睥睨。

他真的睥睨天下吗？再举本书第2章的自陈，提到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者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 1898—1984)：“莱昂内尔个子高挑、容貌英俊，总是让人印象深刻。有一次，罗宾斯在哈佛大学做了一场高水平的讲座，台下年轻的鲍勃·索洛对我耳语说：‘不像他那样讲课的人，都该拉出去枪毙。’……我在某次经济学家的鸡尾酒会上遇见他，确切地说是偶遇。他一身礼服，看上去比任何人更显高贵。他出于客气，非常有礼貌地展示出了对我的兴趣。这让我越来越激动，我夸夸其谈，自我陶醉，嗓门越来越高——在过度兴奋之中，我竟然把干马天尼鸡尾酒全洒在了他的笔挺的礼服上。我赶紧愧疚地把餐巾纸递给他。莱昂内尔泰然地说：‘没关系，我亲爱的保罗，不必在意。’……莱昂内尔轻轻戳破了我吹起的这个浮夸的气球。”

盖棺论定，保罗·安东尼·萨缪尔森(Paul Anthony Samuelson, 1915年5月15日—2009年12月13日)是十项全能型的高手，前无古人，至今尚无来者。他是战后数理经济分析革命的奠基者。他不是罗纳德·科斯那类提出重要概念者，也不像亚当·斯密、马克思、凯恩斯那样，建构出新类型的分析体系。他不是“主义”层次的圣者，但在历届诺贝尔奖的罗汉群中，他属于更高一层的观音。萨缪尔森的数理分析虽过时了，但经验与智慧还很有用。

本来我想写部专著，申论萨缪尔森的经济思想史研究。后来明白两件事：(1)我对萨缪尔森的辉格史观与理性重构方法，由衷地无法接受(参见本书第10章《论经济思想史学方法》的按语)；(2)这个议题远超过我的能力，只能写出一篇导论收在书末(见附录)。故译此书弥补愧疚。

本书的25篇文章出自 *The Collected Scientific Papers of Paul A. Samuelson*, MIT Press, Vol. 7 (papers Nos. 460—597), edited by Janice Murray (2011)。文章经过我们重新编排，按主题分6篇陈列。每一章的标题注释显示了各章所对应的原书篇码。萨缪尔森写作这些人与事时，夹带许多时代背景，今日读者未必容易跟上。加上他的用语精简，还有许多“隐语”和俏皮话，让译者在复原过程中颇费心思。萨缪尔森的知识面甚广，有不少专业术语和内容，中译时我们也有些心虚。

吕老师是浙江省特级教师(相当于教授)，是全国优秀外语教师，发表过许多教学研究论文和科技译文，还有两部基础英语教学的专著。退休后时间较充裕，愿意译这本《萨缪尔森自述》，对他来说这是既陌生又艰难的挑

战。吕老师对翻译工作长期高度认真投入，有种难得一见的专注敬业，见证了一句老话：天道酬勤，业道酬精。我一直很难相信，长城是人工血汗的成果，看到吕老师克服困难的韧性，我才自叹弗如地改观。我配合他的初稿，对专有名词与学术背景提供协助。希望中文学界也能感受到，萨缪尔森这座灯塔的热度与亮度。

赖建诚
台湾清华大学经济系荣休教授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特邀教授

目　录

推荐序

CONTENTS

第 1 篇　治学方法	
1. 我的伦理观、科学方法论和工作方式	3
2. 我们时代的经济学：诺奖 90 华诞纪念演讲	14
3. 经济科学的易谬性	31
4. 学术界中的政治不正确	43
5. 经济学的进步	55
6. 论学术合作	60
7. 金融理论回望	70
第 2 篇　学派之争	
8. 凯恩斯主义在美国	75
9. 施蒂格勒和芝加哥学派	101
10. 论经济思想史学方法：三人对话	134
第 3 篇　英雄相惜	
11. 经济学界的不死老兵	155
12. 前 15 位诺奖得主与 15 位拟获奖人	172

13. 战时 MIT 的统计学研讨会 178
第 4 篇　学术生涯
14. 我的学术之路 197
15. 宏观经济学与现实世界 217
16. 八十叙怀:我与 MIT 238
第 5 篇　著书立说
17.《经济分析基础》的由来 245
18. 科学合著者:与施托尔珀的奇缘 269
19. 一个幸运的教科书作者的信条 279
20. 1948 年版《经济学》再版前言 290
21.《经济学》50 华诞 293
22.《经济学》出版 50 周年感言 299
第 6 篇　庙堂之上
23. 我与肯尼迪总统 305
24. 肯尼迪任期的经济学 320
25. 三只鼹鼠 324
附录:萨缪尔森与辉格思想史观 328
译后记 357

第1篇 治学方法

1

我的伦理观、科学方法论和工作方式*

伦理观

许多经济学家——如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克努特·维克塞尔(Knut Wicksell)、莱昂·瓦尔拉斯(Léon Walras)——之所以成为经济学家,是为了有益世人,他们是这样告诉我们的。我成为经济学家则相当偶然,主因是经济分析那么有趣,那么容易。的确很容易,以至于我一开始就认为,在经济分析中必定有更多事情可做。要不然为什么比我年纪大一些的同学们,会被供需关系问题搞得焦头烂额?(羊毛需求的增加,何以有助于降低猪肉、牛肉价格?)

对真实世界的实证分析,制约着我作为经济学家的每个行动,但对结果的伦理关注,从未远离我的意识。我的意识形态很简单:偏袒弱势者,(在其他条件相同下)痛恨不公平。

我对这项道德观毫无贡献。我父母是"自由主义者"(lib-

---

* 原文标题:*My Life Philosophy: Policy Credos and Working Ways*。
原文出处:*Eminent Economists: Their Life Philosophies*, M. Szenberg(e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36—247, 1991。
转载于:J. Murray(ed.), *The Collected Scientific Papers of Paul A. Samuelson*. Vol.7.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2011. pp.887—898.(#574)。



erals，指美国人对该词所理解的意思，而非欧洲“曼彻斯特学派”的理解），我受到这种世界观的影响。这是个容易坚持的信仰。当我的收入终于提高到中上时，我并没感到内疚，也没有冲动要把多余的大衣，送给只有衬衫的陌生人：我父母也许会认为我会傻乎乎地那么做，还会因为未这样做而神经质地夜不能寐。自由主义者的确认为自己有某种公正分配的义务。但远比私人慈善更重要的是，每逢涉及公共政策时，要评估关于效率与公平问题的反对意见。正如我芝加哥大学老师和朋友亨利·西蒙斯（Henry Simons）常说的：“任何良善的事业，都值得为之付出代价。一切都必须推到报酬递减的分界点之后。（要不然，为什么不继续往下推呢？）”

不愿服役者，可以名正言顺地投票，通过公平的兵役法，规定他们与任何人有相同的正概率被征召。再分配的课税问题出现时，我常会对自己的经济利益投下反对票。我赞同堵塞税收漏洞，但无法阻止别人利用漏洞寻求利益。但朝此方向过度努力，不仅会显得没有美感，还会导致某种不适与自责。

我认识的经济学家，毫无例外地都自认为是人道主义者，包括那些踮着脚走斯大林路线的共产主义者，和赞同自由放任的芝加哥学派狂热者。然而，论及政策建议和判断时，大家都十分清楚互相在期待什么。当然不是全体的见解都一致。假如政治经济学是精确严格的硬科学，应该会出现更多的一致意见。如果经济学不是科学，而是一系列价值判断和偏见，那么向经济学家征求议案优劣的意见，除了再次证实经济学家张三是个假装同情的自由主义者，经济学家李四是个自私自利的精英分子，对决策者或国会毫无用处。

我们知道，政治经济学介于两者之间。在任何场合，经济学家的意见确实大多一致。在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我意见不同时，我们很快就以非经济学家无法察觉的方式，找到不一致的根源和脉络。我俩在政策建议上的差异，并非是我俩归纳和演绎信念的离差的无偏估计量。我对失业和商业自由的相对重要性的看法，取决于我的社会福利函数［或者用沃德（Ward）派的统计学家的术语来说，我的“损失函数”］，我可以全然不同意弗里德曼的政策结论，但却可以在经验观察和概率推断的诊断上，双方意见一

致。这也是人类科学家的不完善性。研究我们这些学术小白鼠的人类学家，会记录令人遗憾的事实：我们的良心确实经常扭曲我们的心智和眼睛。空想改良家对不景气发出警告时，保守主义者也会用相同的数据，来预测高通胀的危险。[意识到这种无意识的偏误(在随后的讨论将会详细说明)，我向自我批评和折中主义做了特别的努力。如果我取得了成功，必有记录可证明。]

有位多年来潜心研究帕累托最优的经济学家，很久以前写信给我，说我如果知道了他有多么开明，我会感到惊讶。我确实会的。反思他所写的话语，我惊讶他怎么知道自己还有一颗心？因为他已那么久没用它了。不加以练习，器官就会退化。“要么使用它，要么失去它。”这是自然法则。

随年龄硬化的不仅是动脉。据说经济学家资格越老，就越加保守。他们经常不承认这一点。

就我自己而言，我没有感到自己价值判断的意识形态，自 25 岁以来发生过系统性的改变。最近十年，主流经济学向右稍微移动了一点，但我未受引诱随波逐流。随着年岁和经验积累而改变的，是一个人对可行之事的乐观程度，和对善念的信心。对生产资料的政府公有和计划经济的有效性，我的怀疑有增无减。这不是出于僵化的同情或仁慈，而是对真实世界的大量经验的回应。

我意识到有个场合，让我对市场机制的尊重发生了量子跃迁。这次改变与市场体系的表现毫无关系。它与哈耶克对经济信息的产生和利用所提出的新论无关，也与亚当·斯密、弗雷德里克·巴斯夏(Frederic Bastiat)或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关于市场效率和市场自由度提出的那些旧论无关。我的观点改变，源自 20 世纪 50 年代我对政治迫害事件的观察。

依我判断，麦卡锡时代(McCarthy Era)，美国面临严重的法西斯主义的威胁。我认识很多在政府和大学的人，他们的公民自由权和职业生涯，在当时陷入了危险境地。我近距离观察到，哈佛和 MIT 校方所经历的恐惧和战栗，而这两家是美国最敢作敢为的学术机构。借用威灵顿公爵对滑铁卢战役的说法，参议员麦卡锡后来的名誉扫地，差一点就功亏一篑。相比较而言，尼克松总统的“敌人名单”只是个笑话。而我名列其中，只不过更证明我是个逐渐淡出的“新政拥护者”。我从麦卡锡事件中学到的，是一个社会只有单一雇主的危害。若你被拒于政府的就业大门之外，市场上还有成千上万家匿名雇主，能提供极大的安全保障。我认识一些人，他们在私营产业——通常是规模较小的行业——获得某种工作，因为大公司倾向于安全地

站在政府这边。这是我新感知到的论据，它与其说是支持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不如说是支持混合型经济。

经济学家当中那些自由市场的拥护者，作为个人自由和公民自由的捍卫者能得多少分呢？我对这个议题极有兴趣。多年来我默默记录着美国和欧陆数十位最重要的自由论者的行为和私下言论，我几乎与他们每位都私交甚笃。我会像做采访的人类学者那样，问些精心设计的简单问题，轻松自然地引出对方的观点。如果说记录私人谈话属于失礼，我确是个无礼之人。结果让我感到惊讶，也让我哀伤。巴斯夏和斯潘塞(Spencer)那样的自由放任主义的崇拜者，是愚钝的，总的来说对学者的权利和个人自由毫不关心。朝圣山学社(Mt. Pelerin Society)的成员中，弗里茨·马克卢普(Fritz Machlup)是唯一一个愿意付出个人代价，来站出来声援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的价值观的人。我谈论的，不是英雄的失败。在我的天性中，很少有英雄主义。我也懂得不要对人性期望太多。我的研究发现了这样一个悲哀的事实：对人类价值的真正关心，是稀缺的。

芝加哥大学教给我的是：商业自由和个人自由必须牢牢地相互关联，这既是赤裸裸的经验事实，又是令人信服的演绎三段论。在很长时间里，我对老师教的深信不疑。逐渐地，我不得不承认，这一范式与事实不符。根据密尔的准则来判断，严格管制的斯堪的纳维亚，也比我的美国更自由，或者说至少一样自由。我常向保守派朋友戴维·麦科德·赖特(David McCord Wright)提起这些令人不快的事。他就警告我："你等着瞧吧。没错，在英国和瑞典，公民还未失去自由。市场不受干预，人们在政治上享受自由，这种情况不可能持久。"到现在，我和他都已等了30多年了。

二战结束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写了畅销书《通往奴役之路》，警告说局部改革必然导致全面专制。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不论是横截面数据还是时间序列分析，均为我指出了重要的真相。

1. 受控的社会主义社会难以实现高效率，也几乎从未有自由民主。(哈耶克的警告中非原创的部分有相当大的正确性。)
2. 抵制局部改革的社会，往往是那些被革命过度变革的社会。如果要么是自由市场要么是什么都不是，那往往就什么都不是。的确，在20世纪中叶后，高效的自由市场的最优原型，常是准法西斯社会或全然的法西斯社会，其中有一个独裁者或单一政党，强施政治秩序——没有这种强施，市场就不可能在政治上生存。智利既有军事独裁，又有

"芝加哥小伙"(Chicago Boys)的经济政策,是唯一一个戏剧性的例子。中国台湾、韩国及新加坡是戏剧性较低,但更具代表性的例子。

3. 我能怀有一个梦想。就像马丁·路德·金那样,我也有一个梦想,梦想一个既有效率,又尊重个人自由(如果不是商业自由的话)的有人性的经济。生产和消费的决策,主要都运用市场机制。但信赖市场力量——甚至在事先机会均等的情况下——也会产生最糟的不均等,这种不均等可通过民主国家的权力转移来减轻。福利国家提升公平,会对效率造成损失吗?是的,在总产量提升与平等之间,在安全与进步之间,存在权衡取舍的关系。我把由此得出的最优化的妥协,称为有良心的经济学。我的梦想是让它同时也是有头脑的经济学。

方法论

从哲学伦理学的崇高境界,转到科学方法论的世俗层面,是一种解脱。然而,我宁愿避开讨论"大写"的方法论。套用萧伯纳的话来说就是:有本事的人,做科学;没本事的人,空谈方法论。

当然,我不否认自己有方法论。只是将它说给局外人,似乎没什么意思。将它讲给自己听,亦是多此一举。

我首先是一个理论工作者。但我始终如一地忠于事实。我就读于芝加哥大学时,弗兰克·奈特和阿伦·迪雷克托(Aaron Director)就把"演绎总比归纳重要"这个错误观念灌输给我。当时,这是个被搞混的奥地利方法论信条。我说的"奥地利"这个词,当然不是指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相反,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的徒子徒孙弟子,诸如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和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等人,似乎都给自己戴上了古典李嘉图(Ricardo)主义者的高帽:相信只要在书斋里摇摇脑袋,就能找到政治经济学颠扑不破的基本规律。我记得,迪雷克托嘲讽韦斯利·米切尔(Wesley Mitchell)对经济周期的实证研究,声称该主题最伟大的突破,其实来自哈耶克对该主题的先验论。我相信了这种说法。

我迅速跃过了这个阶段,继续成长。莱昂内尔·罗宾斯在《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初版中,清楚透彻地解释过康德先验论对经济学的意义。他错了。逻辑实证主义现在已被判定,是过分简约化的学说,但它对打击演绎